

王怀超 著

当代中国的 社会主义改革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王怀超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100号

100-100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

王怀超 著

责任编辑：龙润霞

封面设计：藏 洪

责任校对：马丽蕊

版式设计：任志珍

出版发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编：100091 电话：258.2931 258.1868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1992年12月第1版

字数：185千字

印次：1992年12月第1次

印张：7.125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7-5035-0625-3/D·323 定价：5.70元

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序 言

· 江 流 ·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至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走过了近13年的历程。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次重要会议作出这一战略决策的历史意义。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祖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家知道，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它是我们党和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而进行的伟大开拓和创造。我们的改革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前进。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曲折的情况，更引起人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有成就和今后发展的极大关注。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认真总结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从自己走过的路中，从别人走过的路中，经过认真的反思，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指导。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要“很冷静地思考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以便“使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

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挥得更好。”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党，又是一个善于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未来前进道路的党。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集中党和人民的智慧，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会窒息社会主义内在的活力和生机，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十多年的巨大成绩证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十二条原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在讲话中还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要求，提出了我们今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原则。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然，在我们具体地进行各方面、各层次的改革工作时，还会有大量的问题需要在党的路线指导下，去下功夫反复地实践和认识，这样才可能把社会主义改革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这一任务是十分重要而艰巨的。

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积极地、自觉地投身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其他有关的科学知识来

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教训，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王怀超同志在攻读科学社会主义博士学位期间，选择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方向，经过潜心研究，完成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这部著作。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研究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6个发展阶段的想法，并且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内涵、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及改革的原则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参加评审这一论文的专家学者认为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选题好，有很强的现实性；观点鲜明，结论正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资料翔实，论理确凿有据，结构严谨；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当然，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可供进一步改进的十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我希望作者今后能够再接再厉，再进一步地研究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部书就要付梓之时，写这些话作为序言吧。

1992年5月于北京

导 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经过艰难跋涉，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的曲折奋进，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的改革是极其艰巨复杂的事业，在发展进程中，遇到了许多难题，甚至可以说是特殊难题。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出现的历史性变迁，中国改革的道路愈加艰难。当代中国改革的性质是什么？中国改革浪潮兴起的深层原因何在？中国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中国改革的前景如何？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严肃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面前。国内外的有关方面也极为关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方有识之士冷静地进行分析，科学地作出回答。

历史和现实都无可辩驳地表明，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已经艰难地行进了10多年，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许多领域正在从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不少领域新的体制和机制已经开始运转，根本不可能退回去。例如，若要将我们的农村退回到10年前的“大锅饭”体制，八亿农民绝对不会答应。若要让已经或者正在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各种企业，再恢复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也必将遭到广大工人和厂长经理们的联合抵制。这样，势必对我国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性的严重后果，甚至酿成政局的混乱。若不顾现实条件，不考虑社会承受力，乱闯蛮干，也会出现新的混乱，甚至有可能出现更大挫折。笔者认为，可供选择的战略是：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从法律和制度上巩固和

完善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冷静地认真地总结我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教训，从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中，从自己的经验教训里找出一条切实可行、健康高效、稳步发展的改革之路。

中国改革，既是正在从事着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总结这样的历史经验，难度很大，但意义深远。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史事总是时代愈近愈重要。”因为，对刚刚发生的事件，刚刚过去的历史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对于确定今后的路线和方针至关重要。过去、现在、未来是一个有机的链条，统一的发展序列，一环扣一环。只有科学地认识过去，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在，也只有正确地认识现在，才能科学地预测未来。我国学人历来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都是这个道理。

要对刚刚发生过和正在发展着的事情进行理论的总结和科学的分析，首先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气魄和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的坦诚精神。就是要敢于正视现实，服从真理。勇于承认错误，并真诚地从错误中学习，纠正失误，继续前进。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的后果学习来得快。”“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了。要“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以便“使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挥得更好。”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直面现实，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并真诚地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历史的错误将转化为历史的进步。

这是被实践多次证实了的一条真理。

如果说，10年前我们面临的历史性抉择是要不要进行改革，敢不敢进行改革的话，那么，10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抉择，或者争论的焦点，则是进行什么性质的改革，怎样进行改革的问题，或者说是善于改革的问题。即经历了一个从要不要进行改革到怎样进行改革，从勇于改革到善于改革的转变，无论是回答怎样进行改革，还是弄清楚如何善于改革，都离不开对改革历程的回顾，尤其是对10多年改革经验的理论总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当遇到“歧路”时，不应像墨翟先生恸哭而返，应当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想一想，于是选一条似乎可以走的路再走。

总结10年改革经验的目的是，在于探索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确，在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改革大业，没有一整套科学的改革理论，要想取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较为系统、客观地考察一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几十年来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对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进行理论上的思考，从而概括出几点理论结论，以便为今后的改革提供借鉴。

鉴于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涉及面较广，各种历史文献较多，在对中国几十年社会主义改革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的考察分析中，主要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兼及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探讨。限于篇幅，本书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认识过程及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6页。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也是如此。本书的思索，就视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探索征途上的一个铺路石子吧！

目 录

序言	江流 (1)
导言	(5)

上 篇

曲折奋进的改革历程

一、国内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阶段的划分	(1)
二、当代中国改革的六个发展阶段	(8)
第一阶段：改革的初步尝试——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到“大跃进”时期	(8)
第二阶段：在调整中改革——从60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34)
第三阶段：改革的理论准备和局部试验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表	(52)
第四阶段：全面改革阶段——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	(101)
第五阶段：总结经验、整顿调整，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创造适宜的社会经济环境阶段——从198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策到1991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目标已经达到	(119)
第六阶段：改革向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推进——从1991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至今	(129)

下 篇
艰难执著的理论跋涉

一、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内涵·····	(136)
二、当代中国改革浪潮兴起的深层原因·····	(147)
三、当代中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	(154)
四、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问题·····	(168)
五、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	(197)
附录：著名专家学者论中国改革篇目索引·····	(215)
后记·····	(216)

上 篇

曲折奋进的改革历程

要系统地总结改革的历史经验，首先需要对中国改革的历程进行全面的回顾和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对任何社会问题的研究，都应当“（ α ）历史地，（ β ）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γ ）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②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浪潮中，中国是较早提出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早在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的领导层就作出了必须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决定。后来，经过长时期的曲折和反复，于70年代末才重新走上了改革的征途。中国改革走了一条极为曲折艰难的路程。

一、国内学术界关于当代中国 改革发展阶段的划分

关于中国改革发展阶段的划分，国内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总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② 《列宁全集》第一版第35卷，第238页。

的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按照时间顺序，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划分为五个时期：

1.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和建立时期，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即“一五”末期关于改革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思考，以及根据这些初步思考作出的若干决定。其主要标志是：

1956年初，毛泽东经过系统调查研究，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并以苏联为戒鉴，提出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也都对改进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讲了不少重要的意见。

为了改革经济体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国务院于1956年5月至8月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会议对当时存在着的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作了检查，对如何改进体制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改进体制的决议草案。后来又广泛地征求了各方面对改革方案的意见。1957年10月，在扩大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基本上通过了由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这三个《规定》于1957年11月经国务院第61次全体会议通过，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批准，以国务院的名义正式公布下达。这些规定的正式通过并公布，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

2. “大跃进”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1958—1960年）。1958年至1960年是我国的“大跃进”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下放中央直

属企业，扩大地方经济管理权限。改革的主要内容是：（1）把中央各部所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2）下放计划管理权限，实行以地区为主的条块结合的制度；（3）下放基建项目审批权；（4）下放财权和税收权；（5）下放劳动管理权；（6）改变农村所有制结构，建立农村人民公社；（7）扩大企业管理权限。

3. 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1961—1965年）。为了克服“大跃进”导致的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从1961年起，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纠正“大跃进”时期改革的偏差，针对“大跃进”造成的权力过于分散的状况，强调集中统一。为配合调整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并且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

4.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1966—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次范围相当广泛的变动。变动的中心是下放权力，扩大地方各种管理权限，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化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等。1966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方针政策，不管实，或少管实。”^①这实际上已经在酝酿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改革暂时被搁置下来。

颠倒是非的“革命大批判”，造成了思想上、理论上的严重混乱，许多有关经济体制的正确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理论观点，都被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滥加批判，无限上纲，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经济体制方面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遭到废弃或随意更改，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在原有经济体制遭到严重冲击、各种管理制度严重失效的情况下，又开始了一场经济体制的大变动。1970年，制订和提出了以战备为纲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强调各地方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省自为战，

^① 转引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人自为战。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以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开始了。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这一次大变动，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展开的，是一场盲目的折腾。在许多方面重复了“大跃进”时期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教训。原有体制的弊端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无政府状态，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有步骤地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

5. 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1977—）。1976年10月粉碎江青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转机。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克服十年动乱中盲目下放权力造成的混乱，从1977年起，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了一些局部的调整。与此同时，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开始拨乱反正，逐步澄清“四人帮”在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上制造的混乱，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为保障工商企业和农村生产队相对独立的地位，就要适当地扩大他们的经营自主权。这就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各项工作树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1979年4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之一。五届人大和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及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些都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①

第二种观点，以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内容为依据，将中国的改革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58年的改革：行政性分权和重新集中的“改革循环”。我国是最早意识到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需要改革的国家之一。早在1956年，党的决策层就作出了必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主要是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实践中体会到的。当时对传统体制弊端的认识集中表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所作的《论十大关系》中，即苏联体制的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因而，形成了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改革思路。由于种种原因，下放权力的重点放到了在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划分权力和利益上，不少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者称之为“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按照这种思路，1958年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后的第一次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物资供应和投资的决策权。

由于不加分析地、盲目而又过份地下放管理权，致使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而这种经济混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注定不能实行分散决策。于是，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财政、信贷和企业管辖权方面实行重新集中化。但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弊端一直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其后又进行了多次类似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又总是以造成混乱随后以重新集中化告终。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经济中“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所谓“改革循环。”

第二阶段：1979—1984年：以“放权让利”为中心内容的改

^① 此种观点参见《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84年10月版。